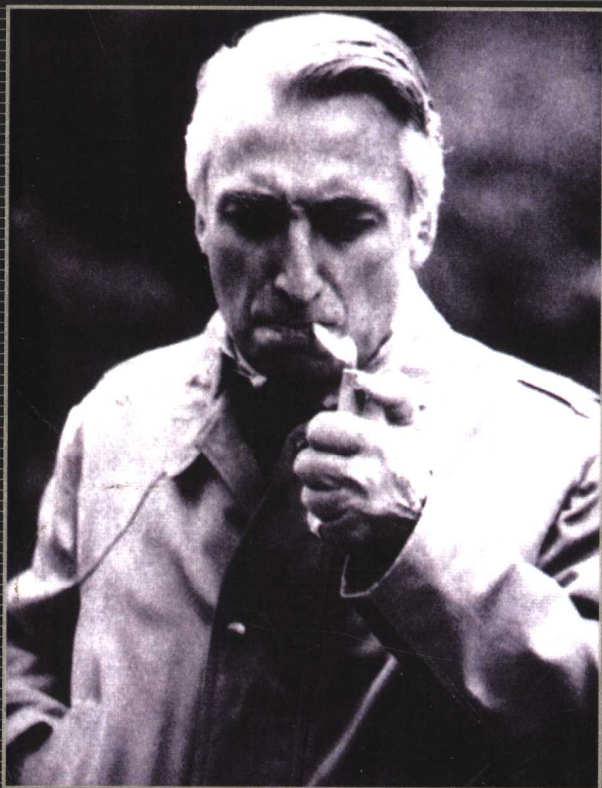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Le degré zéro l'écriture

写作的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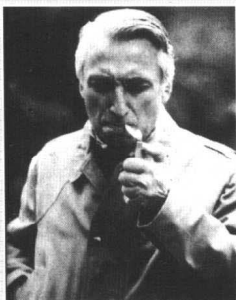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李幼蒸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H05/8

2008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Le degré zéro l'écriture

写作的零度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李幼蒸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作的零度/ (法) 巴尔特著; 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罗兰·巴尔特文集)

ISBN 978-7-300-08835-8

I. 写…

II. ①巴…②李…

III. 写作学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0051 号

本书的出版经由法国外交部资助

罗兰·巴尔特文集

**写作的零度**

[法] 罗兰·巴尔特 著

李幼蒸 译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7.625 插页 3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5 000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总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 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 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

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 Urt 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 Montparnasse 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恃。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二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二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

而后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 20 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 19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 20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须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二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 10 卷 12 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

#### 4 写作的零度

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 写作的零度（1953）·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2）·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

2. 米什莱（1954）：张祖建

3. 文艺批评文集（1964）：张智庭（怀宇）

4. 埃菲尔铁塔（1964）：李幼蒸

5. 符号学原理（1964）：李幼蒸

6. 符号学历险（1985）：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1976）：张智庭

8. 如何共同生活（讲演集1）（2002）：张智庭

9. 中性（讲演集2）（2002）：张祖建

10. 小说的准备（讲演集3）：李幼蒸

附卷：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Eric Marty）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5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

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



“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厢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映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 译者前言

在“罗兰·巴尔特文集”中，我们按照原版本将这三部发表于不同年代的作品编入一卷之内（中译本将此版中原包括的《批评文集》抽出单独出版），它们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巴尔特文学写作观立场的宣示（《写作的零度》，1953），古典文学写作分析（《新批评文集》，1971），以及作者在其最后“新文学”实践阶段对文学写作的再次总结和展望（《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

三部作品中，第一部《写作的零度》，实际上是若干文学批评论文的集成，其中最早一篇发表于1947年。关于作者的文学观，译者已在本文集总序和附论中有所论述。此书思想形成和表达的时代背景是：战后法国左翼思想界和文学界旷日持久的文

坛论战环境。巴尔特那时 30 出头，刚从疗养院世外桃源进入巴黎“抵抗运动”一代正活跃于其中的法国文坛。战后 15 年来法国和意大利文坛和影坛均由左翼文化人主导，而他们彼此一直争论不休，所涉及的问题既包含理论立场方面，也包含政治实践方面。在此由萨特、梅罗-庞蒂、加缪等主导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潮中，今日看来其实充斥着理论概念及其应用方面的混乱。巴尔特作为当时这些新锐“思想大师”的早年崇拜者，却同时也发现了他们争论中的许多认识误区。思考重于行动的巴尔特，从不介入导致上述三人之间尖锐冲突和最后彼此分裂的政治实践选择，而是专注于文学认识论和美学方法论问题，从而使其文学批评论述具有着更为经久的理论价值。

《写作的零度》这本书最初曾被法国 Gallimard 出版社拒绝出版。后来注意和批评本书者多来自法共和萨特阵营，因为巴尔特的文学“中立主义”似乎是直接针对着萨特和左翼文学的“介入道德”观的，虽然他并未在文中点名批评他内心尊敬而理论上不赞成的萨特。结果，本书成为对萨特《文学是什么》（1947）中有关文学应干预社会、生活、政治等主张的质疑。从而开启了日后法国文学批评领域内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长期对立。巴尔特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与左翼文学艺术家来往（包括当时从东德来法表演的布莱希特剧团）最密切的时期，始终对法国左翼亲苏联文艺路线的作为不表认同。（同样的，六七十年代他在法国社会文化大动荡时期也绝不参与任何政治性活动，虽然他并不放弃观察和分析各种左派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包括 1974 年随法国左翼代表团参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本书用语和行文比较抽象，往往比有规范可循的哲学话语更难

理解。其实问题并非在于所用名词的抽象性，而在于其将普通的名词作为“抽象”名词使用时所产生的意义含混性，特别是作为本书中心主题、也是作者毕生思想主题的“写作”（écriture）概念本身。作者力图摆脱思想和形式关系的传统含混性分析，而倾向于直接观察剖析文本的意义构成方式和条件，其结论遂具有特殊的理论启示价值。

以“书写”或“写作”作为符号学或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当代法国思想界特有的现象。虽然作为理论性概念，前有较少理论性意涵的巴太依和萨特的使用法，后有德里达和拉康的过度理论化的使用法，但只是从《写作的零度》开始，“写作”才正式确立其文学理论基本范畴的地位。写作避开现实，朝向语言和形式、朝向写作行为本身。以至于当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美国渐渐被接受的三四十年后，在记号、文本、话语、陈述等符号学概念均已通行无碍之后，“写作”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或美学的基本概念，其涵义和功用在美国人文学术理论界仍然未获得普遍重视。而罗兰·巴尔特的理论天才，一开始就与他对文学话语之意义构成中此一兼具最普通意思和最复杂意思的“写作”概念联系在一起。他说，“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存在着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这就是写作”。于是写作就成为了巴尔特的文学理论设问中心，并被她看作是一种所谓“形式的伦理”，以及看作是一种有关“社会场景”（写作方式）的选择。写作实践的内在含混性则在于：写作始于作家和社会的接触，却通过“悲剧性的逆转”，“使作家从这种社会目的性返回到他创作行为的工具性根源”。

但是，从此书被不断读解的50年后，我们仍须承认作者的这些批评性话语的表达内容过度压缩，似乎他更在乎的是如何迅速、顺

利地完成自己在具体和抽象两轴间快速跳动中的思想记录，而较少关注于如何通过较多例证使其说明更为详尽易懂。作者首先区分了结构和风格这两个概念：“语言结构在文学之内，而风格则几乎在文学之外”，“语言结构的水平性与风格的垂直性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天性。”语言结构是否定性的，风格是必然性的，“它使作家的性情同其语言结合起来”。语言结构和写作风格的突出导致对思想内容的淡化，因此必然反对政治性写作和思想性写作的文学介入观。巴尔特说，古典写作是偏于内容的，其语言是关系性的。“在其中字词会尽可能地具有抽象性，以有利于关系的表现。”“在古典语言中，字词不会因其自身之故而有内涵，它几乎不是一件事物的记号，而宁肯说是一种进行联系的渠道。字词绝不是沉入一种与其外形同质的内在现实中去，而是在刚一发出后即延伸向其他字词，以便由此形成一个表层的意图链。”“在古典语言中，正是关系引领着字词前进……在现代诗中，关系仅仅是字词的一种延伸，字词变成了‘家宅’……字词有如某种真理的突然启示。”这样，巴尔特说，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写作之间就存在着对立，彼此之间发生了“本质性的断裂”。巴尔扎克是纯然古典的，福楼拜则正从古典有力地迈进现代。“资产阶级的写作”既是工具性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又是修饰性的（以功能以外之事进行修饰），修辞学因之而复兴。巴尔特说1848使此“资产阶级的写作”发生了断裂。这种现实主义小说只能够表现一种“惰性的现实”，所谓表现现实的“最佳形式选择”，不过是出于“表现性之惯习”。他说，“在现代主义中不存在诗的人本主义……这些直立性的话语……不使人和其他人发生联系，而是使人 and 自然中最非人性的意象发生联系：天空、地狱、神圣……”。表面上巴爾特的批评论文是针对当时法国战后文学争论

的特殊现象而发，实际上他已触及一个有关西方文学理论内更普遍、更根本的问题。“写作”，与记号和文本相比，实际上是一个“二级”概念，它是一种有关文学写作实践的综合机制，涉及各种不同层面上的相关因素，让我试将其列举如下，供读者参考：

◎ 语言结构：人类思想形成和表达的一般框架和条件；

◎ 言语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实现结果；

◎ 个人风格：与作者个人身心气质倾向相关的特殊修辞学倾向；

◎ 历史时代：社会时空环境内的人际支配关系，它影响着作者思想的形成；

◎ 认知方式：叙事表达和因果关系格式的时代特殊性；

◎ 价值语言：价值偏见和客观再现的混淆；

◎ 主体自由：作者在诸多主客观因素互动关系中的方向选择；

◎ 写作立场：作者在写作实践中最终的方向和策略的决定；

◎ 写作对象：实用目的和表现欲望的区别；

◎ 读者身份：被动消费和积极参与的区别。

以上各项有关写作的主层面，反映了各种外在的制约因素和内在的自由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而所谓自由仍然是高度受决定的；主体选择逻辑理由的欠缺，导致主体自由的运用成为无根据的了。为了达至合理的选择，首先应该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其结果却是，以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本身当成了伦理性选择的标准。

巴尔特始终一贯的研究对象即叙事体文本，也就是小说和历史。小说和历史，表面上一个是虚构，另一个是叙实，但二者均以“故事”编织为目的。从起源上说，小说（其原型是某种故事）和历史极为相似，因为古代之所谓历史类记叙文字，实际上包含着大

量想象和虚构内容，特别是在若干记录之间的时空“联系”方面，均依靠于想象的“填充”。而最后的书写成品的历史类“叙实”文本，其形式和特征与虚构体小说完全一样。巴尔特即从此处切入，同时考察小说和历史所共同具有的叙实文本的结构和功能，包括表现现实过程（因果性叙实）的话语之“真实性”问题。表面上，巴尔特重视的是文学话语的形式分析问题，实际上相关于文学话语的真实性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巴尔特和战后法国之“文学—政治—道德”意识形态运动发生了关联；也同样地与现代派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发生了关联。《写作的零度》于是以间接的方式涉及一般文学理论的问题核心，关系到历史话语和小说话语之中的两种真实性问题。怀疑主义者巴尔特的写作学，向这两种叙事真实性均提出了质疑。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叙事过程能否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此过程显露出叙事文本始终难逃被各种功用主义控制的命运。

巴尔特主张的零度的写作或中性的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如加缪的《局外人》。“文学应当成为语言的乌托邦。”纯文学或高级文学为思想类文学，其最高发展为19世纪小说。小说成为表达现实和真理的幻想工具。但是由于前述各种主客观制约因素，20世纪以来，小说的功能成为高度可疑的，作家的自我真理意识和小说话语的表达现实的能力相互对立。但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发挥了时代认知目标：作家企图以综合的、整体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历史现实画面。20世纪以来，知识和社会环境的根本变化，使得19世纪的小说话语渐渐失去了其表达现实幻想的功能。现实主义小说的目的有二：表现现实和评价现实（等于表达理想和评价标准）。20世纪小说本来已经将对象全面地从

社会转向主体，文学思想的作用（以现代诗为典型）局限于主体领域。法国战时及战后特殊的历史格局导致对古典小说功能的回归：作家重新采取社会道德性的写作目标。但是由于知识环境的改变，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本体论与文学的社会道德论的实用主义混合，产生了一种准逻辑性关联——文学的“介入”道德观。与此相反，巴尔特写作学策略是否定性的。中性的、白色的、零度的写作，即回避或摆脱社会性价值判断和实践介入，以维持一种文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一致性。

《写作的零度》作为一部战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经典，对于长期隔膜于文学形式和机制研究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具有直接的启示性意义。我们不仅应该研究文学思想的“内容面”，也应该研究文学思想的“表达面”，后者的构成分析相关于文学思想表达的背景、能力和目的等方面。这会有助于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更深入地把握文学思想产生和运作的整体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译者发现巴尔特理论起，逐渐认识到传统哲学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分析，必须从符号学角度来重新思考。大约1984年返国不久，我就认为《写作的零度》一书对于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将会十分有用，它应该和《符号学原理》同时尽早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结果两书均于1985年译出，并终于在1988年于三联书店出版。此次再版时，译者对全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核校和改正。

《新文学批评论文集》这部小书为作者所写8篇文学作品评论文的汇集。在这些有关古典作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位更易理解、更接近于传统文学批评的论述风格，其中涉及“内容”之处比比皆是，特别是有关揭示思想和人性负面价值方面。例如作者说，“道德秩序仅是一种偶然性的无秩序的假面”，但它“比最终坚持一种



貌似而怪诞的秩序的说法更具有安心的作用”。（《罗什富科》）“价值归根结蒂只是自我欺瞒。”“不可能存在有关于品德的系统……人之真实的无秩序性……赋予人以一种统一性。”“格言是沙龙的直接产物……格言不断地质疑世俗世界……罗什富科的争议方式既是辛辣的又是不充分的，它巧妙地为一个人阶级必须赋予它自己的质询规定了限度，如果它希望该质询既有净化功效又无危险的话。”而在《夏多布里昂：朗瑟的生平》文中我们读到：“回忆是写作的开始，反过来，写作是死亡的开始。”在《富洛敏丁：多米尼克》中读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被包裹在一种主体的唯心主义心理学中……小说从主体取得其统一性、内容和揭示过程。”最后，甚至于可以读到一些今日人云亦云的理论根据：“‘理性是美的敌人，因为正义和真理是不可分开的朋友’……在阅读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马拉美之后，谁还会理解这种说法呢？”但是，和传统式文学批评不同处在于，我们随时可以发现，虽然作者的批评针对着思想内容，而其观察和分析角度始终也是朝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的，从而暗示着作家写作背后的某种结构性制约的存在。

《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是巴尔特进入这座法兰西学院最高学府时的新文学观（一种文本享乐主义）“宣言书”，其语气恬淡与19世纪五六十年代锐利文风已大为不同。70年代初始发布的《文本的欢娱》虽然是沿着作者一向关注的写作学路线的自然发展，但早期论述中显露的积极怀疑和探索的特点，自60年代末起已进一步朝向一种消极虚无主义文学实践观。也就是，怀疑主义的运作从文本分析风格转移到虚无主义价值主张上来，“欢娱”或“快乐”成为一种空灵的“能指”、成为无目的的目的；其所谓快乐实际上是内心极度颓丧的一种映像。巴尔特进入一所同样不须授予学位、即无教